



集脰太子鼎：中华文明的璀璨瑰宝

本报记者 李严 苏国义 实习生 李笑冉 摄影报道

鼎是中国古代文明中最为重要的器物之一，它的用途广泛，除了作为食器、礼器、乐器和装饰品使用之外，更是代表着传国重器，具有国家和权力的象征意义。

在安徽楚文化博物馆内的楚文化陈列展厅内，就陈列着多种青铜鼎，其中有一款名为集脰太子鼎。这件鼎极具楚文化特色，鼎身为扁鼓腹，左右耳部都刻有铭文，分别为“集脰”和“太子鼎”。鼎上有盖，盖面圆拱形，中部有衔环鼻钮，外部有两圈凸弦纹，外圈弦纹上分布着三个立体雕小卧兽。鼎的腹部浅，有三条高蹄足，腹部有一条突弦纹，足上部装饰有浮雕兽首。

该馆讲解员孙晓菲介绍说，集脰太子鼎是战国晚期楚国的青铜器，1933年出土于寿春楚王陵区的李三孤堆楚王墓。

寿春楚王陵区位于寿春城遗城东南部。据《越绝书》记载：“寿春东鳧陵亢者，古诸侯王所葬也。”现已探明十余座大型封土墓，部分墓葬还发现有车马坑，其中著名的墓冢有李三孤堆、武王墩、大孤堆、小孤堆、望坝孤堆、黄泥孤堆、严氏孤堆等。

据史料记载，战国末期，楚国移都寿春，地处江淮的寿春一跃而成为楚国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中心，楚国公卿贵族、将佐军士、工商庶民一时俱来，寿春城很快就成为两千多年前最繁华的大都会之一。国宝重器、金玉珠宝、甲车武器、文赋书简、工匠技艺等楚文化精华毕集寿春，极尽繁华盛世。

楚国在江淮经营四百余年，在这个历史进程中，不仅疆域东扩，而且江汉楚文化与本土淮夷文化不断碰撞、融合，最终形成了以寿春为中心的特色鲜明的江淮楚文化。

李三孤堆墓是楚国晚期楚幽王熊悍之墓，位于今我市谢家集区双庙村。

1923年春，当时地名为谢家集区朱家集村“李三孤堆”的一个农民在田里劳作时，偶然发现了鼎、壶、镜等青铜器具。他虽然不认识这些物品，但感觉这些东西应该都是很值钱的古董。消息不胫而走，这自然吸引来了盗墓人的觊觎。1933年和1938年，楚幽王墓两次被盗，据不完全统计，出土各类文物4000余件，以青铜器为主，

这些文物时代明确、文化面貌清晰，成为楚国晚期器物断代的标准器，受到国内外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和古文字学家的关注。其中著名的有国宝级文物铸客大鼎（楚大鼎），以及王后少府升鼎、集脰太子鼎等。

1981年，安徽省文物工作队的调查发掘表明，该墓墓口东西长41.2米，南北宽40.2米，墓口以下设有九级台阶，深15米，墓口东端有一条22.4米的斜坡墓道。根据李三孤堆墓的形制、规格及出土相关器物综合判断，学术界基本确认此墓就是楚幽王墓。

李三孤堆楚王墓的发现，拉开了楚文化研究的序幕。

据孙晓菲介绍，集脰太子鼎是一种青铜烹饪器，其功能主要是用于烹饪食物。

由于鼎名为集脰太子鼎，看到这个名字，很多人会不禁想问，这是不是太子用过的器具？根据学者观点，“集脰”可能为楚国掌管王室饮食的机构，而“太子”可能是楚幽王为太子时的称呼。学者根据楚幽王幼年即被立为太子且在位期间未立太子的情况，推测此物为楚幽王为太子时工匠所做，所以名为“太子鼎”。

这种鼎的出现反映了战国时期青铜器皿的多样性和实用性。在公元前475—公元前221年的战国时期，长江和黄河流域广大地区形成了七个诸侯国，各国之间相互竞争激烈，用于战争的青铜兵器增多。同时，也出现了一些纯粹用于生活的青铜器皿，这些青铜器皿不仅体现了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状况，也展示了青铜铸造工艺的高超水平。

集脰太子鼎的表面装饰精美，采用了浮雕和圆雕技法。鼎盖上的三个卧兽和足部的浮雕兽首展现了生动的动物形象。两耳上的铭文历经几千年，依然清晰可见。鼎的结构设计更是体现了古代匠人的智慧，盖中部有衔环鼻钮，既可以拎起，盖上设计的三个卧兽反过来还可以作为盖足，这些设计不仅美观，也增强了鼎的稳定性和实用性。

集脰太子鼎的制作工艺还体现了战国晚期青铜器制作工艺的高超成就，它不仅是一件实用的食器，更像是一件艺术品，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文化水平和审美趣味，是研究楚文化不可多得的一件青铜器。

